

文章编号:1003-2398(2014)01-0043-06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田明¹, 薄俊丽²

(1.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 100875;

2.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地理组, 北京 10003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URBAN INTEGRATIO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IAN Ming¹, BO Jun-li²

(1.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Attache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s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Dongguan, Wenzhou, Qingdao, Wuxi and Shenyang 6 cities in eastern China, this paper builds up an indicator system that is in keeping with China's reality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tegration into urba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 our study we interpret urban integration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mental integration,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urban integration in Qingdao city is highest, the second highest is that of in Shenyang city. And the lowest city is Wenzhou and Dongguan. Wuxi and Beijing fall in between. Basically, that of north cities is higher than south cities in China. The urban integration i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local society. The impacts of city character to urba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at city characters could bring about some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 Positive effect can shorten the social distance and make floating population feel friendliness to cities, but negative effect would deepen the gap. The other is the choice mechanism that different city need different population in development process, so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some floating population who are not necessary labors for some cities. The local dialect of cities has important impact. So, to popularize Beijing pronunciation (Mandari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promotion urba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urban integrati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astern China

提 要: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

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城市融入; 主成分分析; 东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01086)

作者简介 田明(1974)男,河北康保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流动人口等。E-mail: tianm@bnu.edu.cn.

收稿日期 2013-01-13 修订日期 2012-06-11

1 引言

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有效融入城市是市民化以及城镇化能否健康、顺利推行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有三种主要范式来研究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1]:一是人力资本范式,该范式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其逐步适应城市社会各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规则、意义系统的过程,是逐步从一个农民转向现代市民的过程^[2,3]。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低,主要的原因就是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素质禀赋不符合现代城市性的要求,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现代化过程或城市社会化过程的失败;二是社会资本范式,该范式倾向于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极度匮乏限制了其自身在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等方面的获取^[4],进而影响其在经济融入、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城市融入进程。三是制度范式,该范式倾向于认为中国特有的社会体制结构、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具体的制度实践是决定农民工能否实现城市融入的根本性因素。这些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阻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原因^[5-7]。

不可否认,无论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是特有的制度环境都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过程是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融入程度的高低不仅与流动人口自身的特征有关系,还与流入地的特征有关系。以上三种分析方法把一个个城市看作是相同的,不需要进行解释的因素,忽略了地区差异和不同城市个性所造成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异显著,城市类型多样的国家,在不同的城市,流

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是否相同?什么样的城市有利于流动人口的融入,什么样的城市不利于流动人口的融入?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针对研究问题,本文以流动人口问卷调查为基础,建立衡量城市融入程度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对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进行比较,最后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0年6月—2010年9月对北京、东莞、无锡、温州、青岛和沈阳等6个城市非本地户籍,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所做的抽样调查。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比较强,工作地和居住地不固定,登记不全面,本次调研选择在城区的社区进行随机抽样和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集聚区(包括开发区、工业园区)抽样相结合,按照2:1的比例调配,并根据流动人口在各城市的行业分布情况对各城市总样本进行结构控制(分布情况见表1)。

从样本的区域分布来看,这些城市分别代表了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山东半岛地区和辽中南等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特色比较明显的区域。从城市特征上来看北京是综合型的国际化大都市,东莞是珠三角外资企业比较集中的世界著名制造业基地,温州是以私营和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等城市,无锡是以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为基础崛起的大城市,青岛以国有大企业和日韩企业共同发展支撑的大城市,沈阳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城市的选择基本涵盖了东部地区各种类型的城市。在获得的1751份问卷中,其中有效问卷1605份,占总样本量的91.66%(见表1)。

表1 样本分布及人口学特征(n=1605)
Tab.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amples (n=1605)

社会人口特征	
样本城市分布	北京 306(18.94%) 温州 258(15.97%) 东莞 280(17.33%) 青岛 359(22.22%) 无锡 227(14.05%) 沈阳 186(11.51%)
性别	男 979(60.51%) 女 639(39.49%)
年龄	20岁以下 128(13.64%) 20—25岁 355(37.53%) 25—30岁 149(15.75%) 30—35岁 96(10.15%) 35—40岁 87(9.2%) 40—45岁 61(6.45%) 45—50岁 45(4.76%) 50岁及以上 24(2.54%)
打工年限	2年以下 166(17.55%) 2—4年 228(24.1%) 4—6年 162(17.12%) 6—8年 99(10.47%) 8—10年 75(7.93%) 10—13年 91(9.62%) 13—16年 49(5.18%) 16岁及以上 76(8.0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4(10.99%) 初中 442(46.72%) 高中/职高/中专 279(29.49%) 大专及以上 121(12.79%)
婚姻状况	未婚 817(50.9%) 已婚 768(47.85%) 离异及其他 20(1.25%)
户籍	农村户籍 1230(76.66%) 非农村户籍 372(23.34%)
来源地特征	城市 10.48% 小城镇 34.87% 普通乡村 54.65%
行业分布	农业 5(0.31%) 制造业 701(43.81%) 电力、燃气和水生产与供应及采矿业 21(1.31%) 建筑业 112(7%) 交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家政和社区服务等传统服务业 493(30.82%) 金融、房地产、租赁及商务服务业 74(4.64%) 信息、科学技术服务、水利、环境、地质及公共设施管理等服务业 101(6.31%)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娱乐、社会组织等其他服务业 93(5.81%)
来源区域	东部地区 749(47.38%) 中部地区 561(35.48%) 西部地区 271(17.14%)

3 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3.1 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社会融入,国际上主要是针对国际移民及其后代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展开,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8]。Gordon把社会融入划分成文化融入、结构融入、婚姻融入、态度融入、身份融入、行为融入和文明整合等7个子过程或子方面^[9]。Williams和Ortega对Gordon的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10]。但Alb和Nee通过研究认为这七个方面忽略了社会融合中的一些重要维度,比如经济融合和空间融合^[11]。Han Entzinger^[12]等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上的融入,即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Massey的研究开启了空间融入的先河,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3-15]。在国内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在种族、文化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针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不同学者略有差别,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基本保持一致,但突出了社会与生活交往方面的作用^[7,16-18]。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即职业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经济层面形成的生活方式构成社会层面,社会层面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通过社会层面交往才可能达到观念的转变和文化认同及心理上的归属感,即文化和心理层面,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7,16]。

以上三个层面主要是从流动人口这一角度去衡量的,很容易忽略制度层面的融入,也很少提及空间层面的融入。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社会体制结构、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具体的制度实践是决定流动人口能否实现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不同人口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居住隔离,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物化形式,反映了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的疏离程度,是不同于其他几个层面的视角衡量城市融入的重要视角。因此,本研究在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基础上增加制度和空间两个层面,从五个层面来建构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

城市融入涉及的五个层面,每个层面涵盖若干具体指标,每个指标又包含数个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和空间层面等是客观指标,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客观融入状况,而心理层面则是主观指标,反映的是与价值观念、心理满意度、身份认同感有关的测量指标。每个层面的融入指标,详见表2。

在经济层面用收入、工作强度和工作稳定性三组指标来反映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在经济和工作等方面的差距,差距越小融合度越高。用流动人口收入与房价比、流动人口收入与当地城市居民收入的比例和消费后的月结余等来衡量具体收入高低。用天工作时间和月工作天数进行折合算出月工作小时数来具体表达工作强度。用平均每份工作的时间长度来代表工作的稳定性。

在社会层面用家属随迁状况、在当地的定居时长、与当地社会的交往状况以及对当地社会的适应程度三组指标

来衡量社会融入程度,在当地定居时间越长、和家人尤其是配偶和小孩在一起外出,在当地拥有的朋友数量越多,以及能用当地语言交流和习惯当地生活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越高。

在心理层面用对本地身份的认同程度和对当地社会的认同程度两个指标来衡量,希望在当地长久定居、自我感觉与当地居民的差距越小以及对当地的生活方式越认同和与当地居民相处越融洽表示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越高。

制度隔离用社会反映最为强烈的社会保障与住房两组指标,社会保障包括是否享有当地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住房用是否享受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指标反映。

空间融入用居住区位、居住隔离情况和出行距离来反映,其中居住区位包括市中心、城区、郊区以及农村四个级别,居住形式包括自购房、租房和单位宿舍三种,居住隔离主要指居住地是否为外来人口集聚区,此外还有更换居住地点的次数,出行包括离公交或地铁站点的距离,到工作地点的距离等。

表2 城市融入指标体系表

Tab.2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Urban Integration

主要维度	子维度	具体指标
经济融入	收入水平	占当地城镇职工收入的比例 平均月结余额 收入与房价比
	工作强度	月平均工作时长
	工作的稳定性	有过更换工作经历的比例 平均每份工作的时长
社会融入	家庭随迁状况	已婚的夫妻双方在一起 有孩子的和孩子在一起
	定居时长 与当地社会的交往	目前在当地居住的时长 经常来往的当地朋友数量
	对当地生活的适应程度	是否能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 是否习惯当地的生活
心理融入	本地身份的认同程度	是否希望在当地定居、自我感觉 与当地居民的地位差距
	对当地社会的认同程度	对当地居民的行为方式是否认同、 与当地居民相处是否融洽
制度融入	社会保障	是否享有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与生 育保险等
	住房公积金	是否享有当地的住房公积金
空间融入	居住	居住区位、居住形式、周边人口 聚集类型、更换住所的次数
	出行	到最近公交或地铁站点的距离、 到工作地的距离

3.2 指标赋值和正向化及标准化处理

问卷调查针对的是单个流动人口,有些问题直接回答具体数字,比如收入;有些问题是从备选项中进行选择,

比如住房类型的备选包括楼房、平房、地下室、棚户等。有些备选是具体的,有些则是程度的判断,比如是否习惯当地的生活方式备选项包括:习惯、很好;不是很习惯,但相信很快适应;不习惯;很不习惯等四项。经常来往的当地朋友数量备选项包括:没有;1—3个;4—6个;6个以上四项。这些回答无法进行相互间的比较。因此,为了能准确反映各个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对于有量纲的具体数字,用各城市样本的平均数赋值,比如各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劳动强度,采用月平均工作时长来代表。对于备选项的问题,选取最具有显示度的某一选项的比例来赋值,比如是否适应当地生活,只选用(习惯、很好)这一选项的流动人口在各城市样本中的比例。各个城市的具体赋值情况详见表3。

城市融入指标涉及的多个选项,有正向指标也有逆向

指标,指标量纲互不相同。为此首先采用最大值相减的方法来对逆向指标正向化,公式为 $X_{ij} = x_{\max} - x_{ij}$ 。其次对正向化后的指标减去样本均值然后除以标准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最终形成标准化指数。

4 城市融入差异的主成分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进行评价分析,力求评价方法及结果的客观、公正。采用斜交旋转法来解释因子的实际意义,得出对主成分影响较大的因素。主成分分析通过求解观测变量相关矩阵的特征方程,得到 k 个特征值和单位特征向量。将特征值按从大到小排序,它们分别代表 k 个主成分所解释的观测变量的方差。主成分是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线性组合的系数即为相应的

表3 流动人口各层面融入指标赋值表
Tab.3 Urban Integration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6 Cities

	指标代码	北京	温州	东莞	青岛	无锡	沈阳	总样本	
经济									
融入	月收入与房价比(%)	X ₁	15.58	14.98	36.25	23.59	37.46	46.5	29.06
	已购住房比例(%)	X ₂	6.29	1.16	2.88	5.31	11.21	8.2	5.55
	占城镇职工收入比重(%)	X ₃	76.84	53.98	68.47	59.12	71.18	89.11	69.78
	平均月结余(元)	X ₄	1694	1631	1246	1004	1304	1872	1418
	平均月工作时长(小时)	X ₅	250.6	261.99	251.35	257.68	272.38	279.36	260.48
	平均每份工作时间(月)	X ₆	34.36	33.22	21.45	22.51	25.87	22.64	24.09
社会									
融入	已婚的与配偶在一起的比例(%)	X ₇	74.39	75.89	53.51	54.62	66.14	44.44	64.06
	有孩子的与孩子在一起(%)	X ₈	35.92	30.94	23.89	15.54	30.77	29.41	34.44
	平时主要交往对象为当地人(%)	X ₉	6.29	8.91	5.78	19.55	13.9	23.91	12.66
	在当地拥有朋友(%)	X ₁₀	69.87	66.28	58.63	84.08	68.61	74.46	65.05
	能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和熟练运用(%)	X ₁₁	86.76	3.88	22.75	15.68	8.97	64.13	33.13
	与当地人在生活上交往频繁(%)	X ₁₂	11.26	13.57	9.71	23.18	14.35	23.37	15.89
心理									
融入	希望在当地定居(%)	X ₁₃	30.13	13.95	17.63	29.61	30.04	34.24	25.73
	感觉不比当地居民地位低(%)	X ₁₄	28.81	27.98	40.29	39.5	40.81	52.2	38.95
	习惯当地生活和工作方式(%)	X ₁₅	95.36	90.27	94.24	96.37	90.13	98.37	94.2
	感觉与当地居民相处融洽(%)	X ₁₆	38.41	40.07	27.17	52.1	26.01	45.65	39.01
	认同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X ₁₇	31.13	33.85	30.32	45.22	24.66	53.01	36.19
	感觉与当地人没有冲突和摩擦(%)	X ₁₈	96.35	94.16	96.01	94.09	87.89	96.2	94.38
制度									
融入	享受当地养老保险(%)	X ₁₉	41.06	35.66	33.81	46.65	35.43	17.13	36.7
	享受医疗保险(%)	X ₂₀	74.83	77.52	69.06	68.72	57.08	51.91	67.92
	享受当地工伤保险(%)	X ₂₁	32.78	31.4	50.36	45.53	32.7	15.93	36.58
	享受失业保险(%)	X ₂₂	30.46	10.47	18.35	40.22	24.17	11.54	24.32
	享受生育保险(%)	X ₂₃	14.38	11.24	9.84	33.57	31.15	5.26	18.21
	参加住房公积金(%)	X ₂₄	24.67	5.91	6.59	24.93	22.77	9.89	16.6
空间									
融入	居住楼房(%)	X ₂₅	51.66	68.87	94.24	63.69	74.44	64.13	69.08
	居住城区的比例(%)	X ₂₆	52.32	86.82	69.78	65.64	83.41	66.85	69.91
	平均更换居所的次数(次)	X ₂₇	1.80	1.39	1.33	1.29	1.84	1.15	1.45
	住所附近居民多数是本地人(%)	X ₂₈	17.61	28.02	9.71	35.47	37.22	43.48	27.57
	步行到最近地铁或公交站10分钟内的比例(%)	X ₂₉	82.12	72.09	93.88	72.55	82.51	80.43	80.24
	从住所到工作地10分钟之内(%)	X ₃₀	44.85	70.16	84.17	49.16	50.68	64.13	59.68

单位特征向量中的元素。为了达到简化数据的目的, 依据一定的准则提取其中特征值较高、对解释原始数据方差信息贡献率较高(一般不小于85%)的若干主成分予以保留。

提取主成分因子的模型为:

$$F_i = A_{i1}X_1 + A_{i2}X_2 + \dots + A_{ik}X_k \quad (i=1, 2, \dots, m) \quad (1)$$

式中, F_i 为第 i 个主成分因子; A_{ij} 为第 i 个主成分因子在第 j 个指标上的负载; m 为提取主成分因子的个数; k 为指标的个数, 本研究 $k=30$ 。主成分分析法可以把原来多个指标减少到一个或几个综合指标, 这些少量的综合指标能够反映原来多个指标所反映的绝大部分信息, 并且互不相关, 可以避免原始指标的重复信息。同时, 指标的减少便于进一步的计算、分析和评价。

对标准化指数, 利用 stata 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功能进行分析, 计算标准化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方差贡献率、主成分负载, 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看出, 5 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达 100%。用主成分 F_1 、 F_2 、 F_3 、 F_4 、 F_5 代表原来的 30 个指标来评价城市融入程度, 可以完全表达出所有指标信息, 而且这 5 个主成分互不相关, 这样就避免了评价指标信息重复的问题。

表 4 方差贡献分析

Tab.4 Variance Contribution

主成分	特征值	未旋转		旋转后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F_1	9.87187	0.3291	0.3291	7.8402	0.2613	0.2613
F_2	6.70093	0.2234	0.5524	6.4483	0.2149	0.4763
F_3	5.17528	0.1725	0.7249	5.8819	0.1961	0.6723
F_4	4.60312	0.1534	0.8784	5.2810	0.1760	0.8484
F_5	3.6488	0.1216	1.0000	4.5486	0.1516	1.0000

由旋转后的主成分分析可知, 第一主成分贡献率最大达到 26.13%,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第一主成分负载系数绝对值超过 0.9 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与收入与房价比 (x_1)、感觉不比当地居民地位低 (x_{14})、享受医疗保险 (x_{30}) 三项, 既反映了经济层面的融入, 也反映了心理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融入。第二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 21.49%, 是仅次于第一主成分影响最重要的因子, 与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相差并不大, 负载系数超过 0.9 的指标为感觉与当地居民相处融

洽 (x_{16}), 集中反映了心理层面的融入。第三个主成分包括参加住房公积金 (x_{24}) 和 10 分钟内从住所到达工作地 (x_{30}) 2 个指标, 主要是制度融入和空间融入。第四个主成分平均月结余 (x_4), 主要反映的是经济融入。第五个主成分包括居住城区的比例 (x_{26}) 1 个指标, 反映了空间融入。由此可以发现, 除社会层面的融入外其他四个层面的指标都有重要影响, 尤其是经济融入最为显著。

用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根开平方根, 便得到 5 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 然后代入式 (1), 得到 5 个主成分 F_1 、 F_2 、 F_3 、 F_4 、 F_5 。将标准化数据带入五个主成分, 可以得出 6 个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 5 个主成分得分, 见公式 (2)。

$$F = 0.2613F_1 + 0.2149F_2 + 0.1961F_3 + 0.1760F_4 + 0.1516F_5 \quad (2)$$

以各主成分所对应的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 得到综合城市融入程度得分, 见表 5。由表 5 可知某些主成分得分或综合得分为负, 并不说明该项竞争力为负, 而是计算中将原始数据标准化的结果。流动人口在青岛的融入程度最高, 排第一位, 其次是沈阳, 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是无锡和北京, 而温州和东莞最后。

5 城市融入的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特色或个性, 这些特色或个性会对新进入的人口产生作用。城市个性的形成绝不仅仅是限于外观以及外观所呈现的环境状态, 更重要的是由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 不仅包括物质的因素, 还包括人的因素。它既有由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等条件所决定的特征性因素, 又有由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所决定的特征性因素^[9]。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 城市特性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城市特有的个性会对流动人口产生某种效应, 包括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两个方面。积极的效应可以拉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距离, 获得对城市的认同, 并由此而产生亲近感和自豪感, 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有效融入。消极的效应具有排斥作用, 使外来人口产生疏离感, 对城市的认同度较低, 不利于人口的社会融入。另一方面, 城市特性对于流动人口特征的影响在于其具有选择机制, 不同的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是不一样的。不同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能力和在城市中的适应性存在差异, 从而不同城市

表 5 各城市主成分及综合得分和排名表

Tab.7.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6 Cities at Every Principal Component

城市	F_1	排名	F_2	排名	F_3	排名	F_4	排名	F_5	排名	F	总排名
北京	-2.8858	5	-0.9467	5	2.2888	2	-1.3887	5	2.5431	1	-0.3676	4
温州	-3.1998	6	-0.5573	3	-2.4086	5	-0.5393	4	-2.4301	5	-1.8915	6
东莞	0.0664	4	-3.3952	6	-3.678	6	2.1565	2	0.1515	4	-1.0310	5
青岛	0.2845	3	3.9964	2	2.1773	3	3.7008	1	0.4976	3	2.0870	1
无锡	1.3178	2	-0.9106	4	2.5174	1	-0.1169	3	-3.3535	6	0.1133	3
沈阳	5.5840	1	4.0116	1	-1.0439	4	-3.4451	6	2.3134	2	1.8609	2

由于吸引的流动人口群体不同而城市融入不同。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到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的融入程度差别很大。总排名第一位的青岛最高得分为2.087,最后一名的温州仅为-1.892。首先来看青岛,青岛作为我国久负盛名的海滨旅游城市,在国内的知名度较高,流动人口对青岛的认同度较高,所有主成分得分排名都比较靠前。其中第四主成分上的得分排在第一位,第二主成分排在第二位,收入差距较小,体现了流动人口对青岛市的心理认同度比较高,经济融入程度较高。

沈阳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排名第二,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得分排名第一,在第五主成分得分排名第二,体现了流动人口对沈阳市的心理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融入程度较高,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心理差距和心理隔阂较小,这与青岛相似。但是在第四主成分上得分最低,说明沈阳经济融入程度很低,这与沈阳的经济活跃程度不高有关。

无锡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重要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在6个城市中排名第三位,在第三主成分上得分排名第一,但是在第五主成分上得分排名最后一位,空间融入程度最差。空间融入较差与无锡市的空间发展格局有关,无锡市大量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区以外的小城镇,到中心城市距离较远,城市交通延伸不够,造成空间出行不便。

北京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在6个城市中排名第4位,排名较低,在第五主成分上的得分排名第一,在第三主成分上排名第二。北京市作为国际大都市公共交通发达,车站站点比较密集,人们出行方便,企业用工相对比较规范,流动劳动力参加本地住房公积金等比例较高,因此空间融入和制度融入比较高。但是,在第二和第四主成分上排名倒数第二位,心理融入和经济融入程度较低,显示了外地人与北京人的心理差距和经济差距比较大。

东莞是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城市,外资尤其是港台资本占有很大的比例,在6个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位,在第二主成分和第三主成分的得分最低,流动人口的心理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融入程度都很低,只有第四主成分的得分比较靠前为第二位,经济融入相对较好。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在6个城市中最低,在第一主成分得分最后一位,在第三和第五主成分上得分倒数第二,没有主成分的得分排名进入前两位,因此导致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

从以上6个城市的比较可以发现,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这与当地方言有关。我国有7大方言区,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汉语方言北方比较统一,范围比较广泛,内部一致性比较明显,而南方方言种类多、相互差异比较大,即使在同一方言区内,有些方言亚区也相互听不懂。流动人口在一个自己不懂和无法交流的语言环境中,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交流的困难要大得多,因此,南方的东莞、温州和无锡等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要低很多,最直接地影响社会融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对于流动人

口的市民化和城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此外,流动人口在同一城市不同层面的融入程度也存在差异,这体现在主成分得分排名上,同一城市有的主成分在六个城市中排名第一,有的排名末尾。比如东莞经济层面融入比较好,但心理融入程度却最低。其次,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与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人口的比例呈相反的变化,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其融入程度越低。例如温州和东莞,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最高,城市融入程度则最低,而沈阳流动人口的比例在6个城市中最低,融入程度则比较高。

参考文献

- [1] 梁波,王海英.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 已有研究的综述[J].人口与发展,2010,16(4):73-91.
- [2] 陆林.融入与排斥的两难 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97-103.
- [3] 潘泽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J].中州学刊,2008(3):109-113.
- [4] 钟水映,李魁.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500-505.
- [5] 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兰州学刊,2007(7):87-90.
- [6] 钱文荣,张忠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度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15-121.
- [7]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 [8] 任远,郭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人口研究,2006,30(3):87-94.
- [9] Gordon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0] Williams J A, Suzanne T O. Dimensions of ethnic assimilation: an empirical appraisal of Gordon's typology[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90,71(4):697-710.
- [11] Ala R, Nee V.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31(4):826-874.
- [12] Entzinger H, Biezeveld R. Benchmarking in Immigrant Integration [M]. Rotterdam: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2003.
- [13] Massey D.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empirical review[J].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1985,69(3):315-350.
- [14] Massey D, Denton N. Suburbaniz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US metropolit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3):592-626
- [15] LaRuffa A, Carmelo M. An Italian-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Bronx[M].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1988.
- [16] 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5(5):90-95.
- [17] 风笑天.落地生根? 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学研究,2004(5):19-27.
- [18] 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8,14(1):3-23.
- [19] 马武定.论城市特色[J].城市规划,1990(1):31-33.

责任编辑 赵永宏